

#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邬晓燕

**摘要:** 全球生态危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工业文明范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社会推行的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现代化实践因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当代形式的生态危机,无法召唤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而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应主动激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变革力和愿景引领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关键词:** 文明范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1-0018-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sup>进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中的目标指向<sup>[2]</sup><sup>24</sup>,旨在通过文明范式创新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愿景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狭义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从广义而言,则是统摄“五位一体”、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层面的具象表达,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典型形式,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诉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动探索和创新回应,怀有深切悠远的世界意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基本问题:全球生态危机为何引发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诉求?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哪些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指向,从而有望担当起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如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 一、全球生态危机与文明范式变革

文明范式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人类社会所赖以运行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有机构成体系,它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基调、内涵和趋向<sup>[3]</sup>。18 世纪率先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开启了波澜壮阔的西方现代化运动,创造出物质生活丰裕和精神生活丰富的现代文明成果,锻造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科技生产力、资本增值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模式、物质主义的消费文化等工业文明范式。马克思评价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收稿日期:2022-11-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转型的协同演化研究”(21BZX051)。

作者简介:邬晓燕,女,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4)。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sup>[4]</sup>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现代大都市和世界市场,也带来了烟囱、污染和劳动异化,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sup>[5]</sup>。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批新兴国家通过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获得独立身份,开启了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模本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以八大公害事件和六大污染事故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风险全面爆发,揭示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性、交叉性、全球性和人为性。人类生存与持续不仅面临人口与资源压力、化学污染、生态破坏、核废料处理、能源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直接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要面对生物战争和核战争阴影、生态移民、生态资源竞争、生态帝国主义等社会伦理冲突,催生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工业文明范式的生态批判和绿色变革要求。

### 1. 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批判

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批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模式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启了西方社会的环境启蒙,直接促成了美国各州相继出台法令禁止 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又叫滴滴涕)等剧毒化学农药使用;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对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五大变量进行实证性研究,揭示人类“无限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提出“零增长”方案,尽管遭遇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针锋相对的驳斥,但为人类确立了资源有限性的基本共识。其后,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召开,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通过《可持续发展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各国推行的国家战略。

### 2. 消费主义文化浪潮的影响

不同视角的生态批判与技术社会批判聚焦于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科层体制和大众媒介推波助澜制造的消费主义文化浪潮。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永无休止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的体制特征,资本主义想要在有限的环

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而将自然资本化的环境经济学和将自然环境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市场行为,是一种更为危险的生态殖民主义,并以《京都议定书》这一失败案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会逆转对环境产生灾难性影响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其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sup>[6]</sup><sup>13</sup>。贝克和吉登斯等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批判科技理性的垄断和工业社会的文明风险,指出人类社会正从传统工业社会转向世界风险社会,主张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转型,倡导生态现代化和协商治理以消除“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制度弊端。法兰克福学派和消费社会理论批判现代传媒和文化工业携手制造“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文化,炫耀性消费和象征性消费激发人性的无穷贪欲、加剧恶化业已不堪负荷的生态环境、消弭人类的自主精神追求。人文主义者弗洛伊德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愈益与人的需要相背离,致使整个人类患上了“集体神经症”,弗洛姆则将工业社会称为病态社会或不健全社会,警示人类文明已处于危急关头。

### 3. 工业文明范式自身深陷危机

尽管西方社会推行的绿色发展路径形式多样,但因囿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映射出工业文明范式自身深陷危机。

西欧各国为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的零和博弈问题,纷纷推出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旨在重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关系。1982年,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首次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重新定义环境、技术与发展的关系;2009年,联合国环境署公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进入21世纪后,绿色工业革命浪潮奔涌不息。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上,欧盟委员会宣布欧洲绿色新政,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使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加快循环经济和绿色转型。然而,令人感到悖谬的是:一方面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和国际共识,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生态运动和绿色新政根本不可能提供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案。因为西方绿色发展尽管路径多样,但都囿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内。其一,生态治理的技术策略或经济政策

如果脱离制度批判,往往会陷于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改革传统技术,可以减少污染,但无法消除污染;发明环保技术,可能拦截或稀释部分污染物,但也可能导致污染藏匿或扩散;科技发展在控制污染的同时又制造出另一种新型污染,陷于无休无止的污染循环;征收各种生态税或推行碳交易机制等实际上在默许或纵容污染持续和环境不公扩大。其二,西方国家为继续享受不负责任的发展成果,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战略,加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掠夺。针对局部环境问题采取生态政策或技术干预,或许可以达到短期和中期的环境改善,但面对日益严峻的累积性环境恶果,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全球产业布局大转移”或“污染转移”策略,其后果是发展中国家因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而遭受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双重压力。其三,通过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实现生态救赎的幻想破灭。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兴起一股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乐观主义狂潮,寄望耗能少、污染少的信息技术和环境友好的清洁技术自动带来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乌托邦。吊诡的是:一方面,信息技术难以减少社会发展总的原料流量;另一方面,因其高效的计算能力和处理能力,反而加快了原料流动、生产和消费全球化,加剧了时尚翻新和资源消耗。可见,工业文明范式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愈益解题乏力,或者说正是工业文明范式导致和加深了人类生存困境。

#### 4. 文明范式变革亟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引领

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萨卡所作的一个生动比喻:“我们无法想象一辆不需要能源的汽车。”<sup>[7]</sup><sup>141</sup>一方面,西方社会呼吁工业国家降低资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却承诺或坚持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不能因生态转型而受到任何影响。如此自相矛盾的表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革新,本质上就是拒绝触动根深蒂固的工业文明范式和资本主义剥削本性。罗马俱乐部在近半个世纪后出版新著《翻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其中悲恸地写到:《增长的极限》中做出的预测几乎都得到了印证。全球可持续意识和生态友好型增长方式似乎都在创新培育,但人类生态足迹和人类生存困境还在扩大和深化。究其根源,“当前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sup>[8]</sup>。里夫金在《零碳社会》中说,绿色新政呼

声高涨,但人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完成这一使命的清晰的“工业革命”道路<sup>[9]</sup>。换言之,延续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可能带领人类社会实现从化石燃料文明主导的地缘政治世界观到生态时代主导的生物圈世界观的范式变革,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形态,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必须落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要实现人类文明范式的绿色化变革,唯一可行的出路是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sup>[6]</sup><sup>96</sup>。

##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 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过程,将引发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的深刻变革;狭义而言,是指落后国家采取高效途径和有利传统因素,通过技术追赶、社会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和追赶先进工业国的发展过程<sup>[10]</sup>。由于现代化起源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耦合”,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导地位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对外输出<sup>[11]</sup>,也造成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认识误区和实践弯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风险到深度参与国际治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文明跃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独立探索和主动创新冲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线性模式和零和博弈思维,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现代化探索的首要前提是民族独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地位确立。“如果我们不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我们就不可能发展出中国崛起的文明意义和价值意义。”<sup>[12]</sup>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后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现代化事业的历史征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

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中国人民团结聚力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主地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工业技术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准把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确立“以经济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文化中的小康社会构想相结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经济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从“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的发展步骤,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形成战略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升华,明确了新时期接续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路标。

在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探索进程中,中国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敏锐辨识出人类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诉求,并及时跟进全球环境治理步伐,加快建设和完善环境治理法制,不断推进发展观变革和生态文明实践,逐渐探索出别具特色的绿色现代化道路,创造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我国出台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初步启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94年,发布《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了从“经济发展导向”到“科学发展导向”的发展观转变,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绿色发展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主题,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战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赋予其贯穿全局全过程的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之后密集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环境监察办法》等100多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基础上新增“美丽”关键词,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政治高度和战略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和阐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铿锵有力地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2]22</sup>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sup>[2]23-24</sup>。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守“走自己的路”的创新原则,主动地、持续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破解了“发展性与独立性”非此即彼的现代化悖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维度和鲜亮底色,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形式和典型样态;既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范式变革的绿色化趋向,又深刻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建设世界生态文明中的伟大前景;既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希望的愿景指引。

###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蕴含

作为一种新生的文明范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包含哪些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而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具有深刻影响人类发展前景的现实变革力和愿景引导力?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 1. 从理论特质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立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扬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基因和生态思想、关切社会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文明新形态。

其一,生态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生态文明进入政治话语和国家战略初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更是中国生态文明的特色之源,决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组织原则和价值内核。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因时变义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报复论”等经典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历史观、生态发展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系统观,对新时代绿色发展和生态治理形成科学有效的指导。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和生态文化滋养,有助于克服西方工业文明的主客二分对立思维、生态治理的短视思维和割裂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sup>[13]</sup>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孕育发展出了深厚隽永的整体性思维和生态文化,譬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人合一观,“仁民爱物”“厚德载物”“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伦理观,“道法自然”“与天地参”“致中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生态治理观,“取物适时”“以时禁发”“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行为准则,有益于破除西方工业文明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形成有机论、整体论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

其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生态愿景和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指向人类命运的光明前景和共同体的总体观照<sup>[14]</sup>。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资本逻辑和生态改良主义,坚持“以人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目标,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协同推进美丽中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 2.从范式结构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更高阶段的新文明形态,包含着与该阶段物质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自然观、组织制度、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

整体革命和系统变革。

其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既承认自然生态系统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和客观必然性,又强调人与自然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多维度的立体性关系,亦即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既要立足于历史动态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更要着眼于共时结构意义的特定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选择<sup>[15]</sup>。另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演化性,主张人类面对的不是原始的天然的自然,而是处于人类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自然,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改善人类发展条件和通过社会转型和文明范式变革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二者协同演化、共生发展。

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织原则和民主治理的制度安排。确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整体产权属性,从产权安排上保障社会整体生态利益;赋予国家在追求生态文明价值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坚持从社会整体和人类文明的价值关照和从代际公平与全球正义的立场出发,倡导构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文明<sup>[14]</sup>;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环境治理体制,完善政府绿色GDP(国民生产总值)考核机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生态福利的公平分配、生态责任的风险共担。

其三,坚持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相统一的价值体系。以生态为本,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统揽全局的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人为本,要求认真审视人的真实需要以克服虚假需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秉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激发人民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创造性。

其四,倡导节制有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进企业和工厂的清洁生产,构建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体系,创新联动生态文明教育的媒介传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推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公共交通出行等绿色生活方式,提升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

约资源、绿色消费的全民绿色发展意识。

### 3. 从实践向度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现实指向性、发展阶段性和价值引领性。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是对人类文明风险、西方现代化模式窠臼和资本主义生态变革痼疾的批判性求解。弗洛姆指出,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富有、快乐的人类新时代,但却面临一种文明的风险,“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却没有使用这些力量的智慧”<sup>[16]</sup>。西方现代化模式造成了生态危机、社会单向度发展、生态殖民主义等现代性负效应,资本主义因其制度根源而无法解除这些结构性危机。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sup>[7]5</sup>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作为新生的文明范式,有一个孕育、崛起、成熟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变迁。马克思指出,旧社会形态在发挥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之前绝不会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绝不会出现<sup>[17]</sup>。不同文明形态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不同文明形态循序渐进又有所重叠并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孕育、生发于现代化运动和工业文明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尚未完全耗尽其生产力潜能和自我调适机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须在与工业文明共存与竞争中通过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而逐渐赢得新文明范式的主导地位。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是现实批判与愿景建构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地球美好家园繁荣共建的理想愿景,对社会转型和文明跃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意义。“决定任何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态度和信念。”<sup>[18]</sup>理想愿景蕴含着一种为美好生活创造适宜社会环境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指引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典范展开想象并倾向于按照这一典范行事,应主动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文化条件来加快范式确立和社会转型,最终从一套制度转变到另一套制度,从一种文明转变到另

一种文明,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引领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以其深厚的理论内涵、内在规定和实践向度创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将在人类文明演进与跃迁过程中逐步获得其完整表达,展现其成熟样态,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恰当的回答。

### 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自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地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建设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和“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隐藏着中国式现代化纵深前进面对的挑战和阻力。“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千年梦想;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sup>[2]6-14</sup>。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不少困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高质量发展存在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科技竞争面临国际封锁,逆全球化潮流翻涌等,只有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

文明范式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解读,为政策制定和行动策略提供价值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内生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选择与变换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创造的“具有独立自主性的选择性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轴线,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凝聚和愿景引领。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方向,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变迁而不断提高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要求以高水平生态环境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突破将生态文明建设狭隘化为生态环境保护的误区和格局,站在绿色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贯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国家治理绿色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培育、适度有节的绿色生活方式塑造等系统变革与协同推进当中。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强调创新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弯道超车,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都要依托于创新发展绿色科技、绿色能源和生态产业,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从生态脱贫走向生态振兴的发展步伐,建设天蓝水清人美的美丽中国。

其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要求实现对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双重重建,培育具有生态伦理意识、生命价值关怀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新人。

## 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关涉人类命运。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生态环境问题攸关人类社会的存在境遇和持续发展,全球生态危机形势的总体恶化昭示文明范式转型的全球共识与国际视野。“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这种关系的具体性质与发展状况是人类文明化程度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sup>[19]</sup>习近平总书记倡议:“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sup>[20]</sup>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生态破坏、疫情笼罩的文明风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经验,引领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表征着一种审视国内生态约束和回应全球生态危机相统一、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相契合的人类未来发展趋势。从环境意识启蒙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再到全球绿色新政和21世纪绿色工业革命,生态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共同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承认人类生存面临“增长的极限”,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基石,在对人类命运总体观照的基础上建构可持续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伦理原则,易于凝聚更广泛的全球共识、更积极的全球生态治理协作。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道路选择与文明互鉴的统一,是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是文明创新与文明共享的统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现代化转型和文明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尤其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实践和力度世所罕见,塞罕坝农场生态治理、库布齐沙漠治理成为国际治沙名片、“一带一路”生态与科技合作等生态实践典范,为全球环境治理协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也要求各国政府搁置短期利益和意识形态纷争,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同心圆,促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向更合理、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其三,资本主义创造的“虚幻的共同体”产生了内生结构性矛盾与全球系统性危机,制造了中心-外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剥削对抗关系<sup>[21]</sup>,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助于人类社会超越“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埃德加·莫兰指出,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人类世”时代,但我们却仍然处于人与人、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野蛮时代,变革人类的未来需要一种整体性、复杂性的思维<sup>[22]</sup>。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是局部修补或零敲碎打,而是制度变革和系统革命,要求克服西方现代化粗放式、掠夺式的增长痼疾,破除“资本”与“人民”、“物本”与“人本”的尖锐冲突,帮助发展中国家跳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依附型现代化陷阱,坚持以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

推进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协作和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国家、民族、种族的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差异性,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关切,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1).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杜明娥,杨英姿.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9):115-118.
- [4]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5.
- [5] 李成旺.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增订本)[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47.
- [6]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7] 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 [8] 魏伯乐,维杰克曼.翻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3.
- [9] 里夫金.零碳社会:生态文明的崛起和全球绿色新政[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XXIV.
- [1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13.
- [11] 刘慧.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双重视野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J].理论视野,2022(1):48-54.
- [12] 黄万盛.什么是中国?——轴心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文化主体性[J].文化纵横,2016(4):84-93.
- [13]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1).
- [14] 杨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认知、愿景与实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2):122-132.
- [15] 郁庆治.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8-26.
- [16]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355.
- [1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
- [18] 芒福德.乌托邦的故事:半部人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87.
- [19] 唐干钧.中国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及其当代意义[J].云梦学刊,2021(6):49-55.
- [2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5.
- [21] 邢海晶.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J].社会科学辑刊,2022(4):32-38.
- [22] 莫兰.整体性思维:人类及其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98.

##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Paradigm and the New Patter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u Xiaoyan

**Abstract:**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has exposed the unsustainable nature of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model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vario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s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carried out by the Western society can not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the ecological crisis, which is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the capitalist crisis, because they have not touched the capitalis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this case, the world calls for a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paradigm. The new patter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m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has specif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paradigm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This new form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paradigm of civilization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stimulate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ivilization paradigm;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思 齐